

——从工业文明到新的生态文明，难点在于，习惯了传统工业时代的人们，面临着柏拉图洞穴寓言的思维困境：不相信洞穴之外的真实世界；而即使相信，他们也无法适应一个大不同的世界，宁愿继续留在洞穴。问题在于，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的危机，人类的“洞穴”亦在被破坏。因此，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是关乎存在还是毁灭的问题。

走出柏拉图洞穴寓言的思维困境

——从传统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

张永生

本文为该书自序：张永生，2020（待出）：《从负担分担到机遇分享：应对气候变化新思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这本专著是在我多年气候变化研究基础上形成的阶段性小结。对我而言，进行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最开始只是因为工作需要而以一种客串的心态完成交办任务，并没有计划将其当作自己的研究主业。没有想到，气候变化问题大有乾坤，竟然给我提供了一个跳出传统框架思考（“thinking outside the box”）的独特视角，引发我对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分析框架进行重新反思和拓展，并在生态文明新的框架下开始了新的研究探索。

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之前，中国在国际上面临很大的气候谈判压力，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当时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每次都要涉及的几个重要话题之一，迫切需要有力的政策研究支撑。我当时供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作为中央的主要智囊机构，开

展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也就义不容辞。为此，时任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研究员组织骨干力量专门进行气候变化的研究，并将其设为发展中心两个经常性重大课题之一。这项工作由当时的中心主任张玉台研究员作为课题负责人，副主任刘世锦研究员任课题执行负责人，可见中心的重视程度。我作为协调人，具体负责推进课题的研究工作。

当时国内研究气候变化的，多是能源、环境、工程、气象、地理等学科背景的学者，甚少有从事理论经济学的学者参与，而气候变化又是一个跨学科的议题，仅从科学和工程的视角进行研究远远不够。在此之前，我一直从事更一般的经济学和政策研究。虽然我们当时并没有太多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背景，但从理论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却也是一个优势。

我们研究应该说颇有成效，不仅给中央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议，还发表系列中英文学术论文。其中，系列政策建议先后多次得到温家宝、李克强、张德江、汪洋、张高丽、回良玉、马凯等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决策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刘鹤副总理当时在发展中心任党组书记，对我们气候变化研究的成果也有批示。后来，发展中心又将“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设为“重点政策研究基础领域”之一，我作为学术负责人和首席专家，持续推进这项研究。我也作为中国专家代表，参加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系列“基

础四国”部长会议专家会、中美气候变化 1.5 轨专家对话会等较为重要的国际活动。

在气候变化的研究上，我和团队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代表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在第一阶段，同当时主流的认识一样，我们也是将减排当作一个负担。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在各国间公平合理地分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所需的碳排放空间。我们基于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和产权理论，为以人均历史累积排放为标准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设想建立理论依据。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提出“国家排放账户方案”，直接服务于国家气候变化谈判。

第二阶段，我们认识到，关于减排影响经济发展的主流认识可能存在问题，减排有可能使经济跃升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结构，从而减排就不再只是一个负担，更是一个机遇。国际主流学界讨论的重点是所谓全球最优减排度，就是减排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由于减排的好处被定义为未来损失的减少，故未来好处的贴现率大小，就成为研究争论的焦点。我自己觉得，这种给定分工结构下的主流边际分析，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它在理论上无法预见减排带来的分工结构非连续跳跃产生的新机遇，从而在政策上会有一定误导。于是，我同史鹤凌教授进行合作研究，用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的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减排有可能使生产结构跃升到一个

更有竞争力的分工结构”。在这一新的研究思路下，我们开展了系列研究，提出了包括“绿色发展机遇论”、“国际气候谈判应从负担分担转向机遇分享”等标志性结论和政策主张。在201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世界银行合作的“2030年的中国”大型合作课题中，我负责其中的绿色发展支柱报告。虽然当时绿色发展被很多人视为负担，但我们基于自己的研究，就观点鲜明地以“抓住绿色发展的机遇”作为报告的标题。对我们研究工作进行综述的英文学术论文，也以“Climate change and green growth: a perspectiv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为题发表。

第三阶段，我们认识到，仅仅有生产领域的结构性变化，还不足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必须要有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如果只是生产结构的变化，即用所谓新的绿色技术或生产结构进行生产，而不改变生产和消费的内容的话，则技术进步虽然会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环境强度，但技术背后的内在商业力量，却会驱动总消费规模更大幅度地扩张，从而总消费规模扩张带来的环境后果，就会超过强度下降的环境改善效果。传统工业化模式，就正是建立在这种所谓消费主义和过度消费的基础之上，由此带来不可持续的危机。因此，如果没有发展理念、发展内容、消费内容、组织模式、商业模式、体制机制等发展范式的系统性转变，则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就难以得到真正解决。这就涉及到对经济学一些根本

问题的反思，包括价值论问题。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福祉，而发展什么内容及发展的经济、福祉和环境等后果，又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就正如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需要经历社会价值观念的系统性转变一样，从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社会向可持续的生态文明新范式转变，也需要价值观念的系统性转变。

但是，要理解和揭示这种转变，就必须跳出标准经济学的思维局限。第一个局限是，标准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分工结构外生给定条件下研究资源最优配置问题，难以处理不同分工结构非边际的变化，从而就难以预见减排带来的机遇。第二个局限同价值理论相关。标准经济学是在偏好外生给定条件下进行研究，同时消费者的效用则由其消费的有形商品数量来决定。这使得经济学处理的问题只是复杂经济现实的一个局部。如果不能跳出这个局限，就难以真正理解人类行为及其经济、福祉和环境后果，从而以偏概全地得出误导的结论。

突破这两个局限的理论基础，一个是古典分工与专业化思想及其现代理论；一个是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福祉经济学为代表的理论。分工与专业化的演进，意味着经济组织拓扑性质的变化。标准新古典边际分析处理的所谓一般均衡，在分工与专业化的一般均衡视角下只是众多可能的结构之一，而基于这个“之一”的特例得出的结

论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就难免“盲人摸象”。行为经济学则代表对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拓展。大量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显示，很多标准新古典经济学预见的行为模式，同事实并不相符。偏好不仅是变化的，而且常常被商业力量操纵；能够满足效用的，也不只是对有形商品的消费及卷入市场交易的内容。那些认为消费者在市场中“自由选择”行为只是消费者自由意志表达的想法，很多时候只是停留于表象。这个背后，涉及到对经济学根本的价值理论问题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思考和揭示。

爱因斯坦说，“我们不能用过去导致这些问题的思维，去寻求问题的解决”。因此，必须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进行思考。不幸的是，在思维转变上，我们面临着柏拉图洞穴寓言的困境。我自己的学术旅程，让我经历了两次思维框架的跳跃。第一次是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框架中跳出来。一旦从给定分工结构下资源配置的狭隘边际分析视野中跳出来，从更大视野来思考分工结构的非连续变化，就会发现很多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看似逻辑严密的分析结论，实则受限于其狭隘的分析视野而不可靠。第二次则是从传统的工业化思维框架中跳出来。标准经济学局限于传统工业时代“人与商品”的狭隘视野，而一旦从“人与自然”更宏大的视野和新的价值观进行思考，则看到的世界就是另外一番模样。第一次跳跃，我受益于关于分工与专业化方面的学术训练和研

究。第二次跳跃，则受益于我很偶然开始的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的研究。它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于标准经济学的视角，并让我受益于同大量跨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目前的标准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其分析视野局限于狭隘的“人与商品”关系，价值基础更多地局限于有形商品且卷入市场交易的消费带来的效用满足，而生态文明则从“人与自然”关系更宏大的视野进行分析，且其价值基础超越有形的商品消费。“人与商品”之间关系，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子集。当现代标准经济学试图用一个“子集”的视野来认识“全集”，并以“子集”为中心来改造“全集”时，各种生态环境危机以及种种“现代社会病”等扭曲问题，就一定会出现。一旦跳出狭隘的传统工业时代的坐标系，进入到生态文明新的坐标系，则标准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成本、收益、效用、福祉、资源、最优化等概念，就会被重新定义。原先在标准经济学视野下确信无疑的理论，很多就难以再成立。我之前做的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理论思考，很大程度上也没有跳脱传统工业化视野。

由于我们出生伊始就处于传统工业时代，接受的亦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我们的思维很自然地就被局限在传统工业时代，就像柏拉图的洞穴囚徒寓言面临的思维困境。当有一天，一个囚徒跑出洞穴，然后兴冲冲地回

来告诉其他囚徒世界的“真相”时，那些习惯了洞内生活的囚徒，断不相信有这样一个真实世界的存在；而即使相信，他们也无法适应一个大不同的世界，宁愿继续留在洞穴。当我有了这些学术经历和思考，再回过头来看标准经济学的很多研究，就有了回到柏拉图洞穴时代的感觉。

这是为什么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缺乏真正理解，且只是予以象征性重视的原因。在现有标准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并没有生态环境问题的真正位置。大部分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不认为可持续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认为市场之手可以催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从而解决不可持续问题。他们更多的只是将生态环境领域视作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分支或边缘学科。与此同时，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学者，出于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切身认识，加上对标准经济学解决可持续危机的无力感，他们发展了一套难以与主流经济学家进行对话的分析体系和语言体系。因此，主流经济学家和可持续发展学者，往往自说自话，难以相互沟通。

对我而言，这本书更多的是我自己一个研究阶段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的开启。在这个阶段转换之际，我亦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到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工作，在新的研究议程下开启新的研究。我们目前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将所谓标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

生态环境领域，而是从生态环境危机出发，在生态文明新的框架下对标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和拓展，以重塑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生态环境、经济体系和经济学。从传统工业时代“人与商品”的狭隘视野，到“人与自然”更宏大的生态文明视野，就类似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变，但一切又都发生了大的改变，因为分析视野、价值基础、结论和政策含义均发生了改变。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分支，都可以从这种视野转换带来的反思和重构中受益。因此，从传统工业文明视野扩展到生态文明新的视野，就会发现一座新的学术金矿。

我要特别感谢刘世锦研究员多年的帮助和指导，感谢论文合作者史鹤凌教授、宣晓伟研究员，以及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的团队成员和众多同事们。我难以挂一漏万地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要特别感谢我工作了25年之久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些年，我完全受兴趣驱使做研究，潜心坐学术的冷板凳，而收获也颇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我提供了自由宽松的小环境进行研究。作为一个政策研究机构，发展中心的职能虽然并不在于纯学术和理论研究，但要真正做好政策研究，又必须基于深厚的学术和理论研究。而且，发展中心研究的都是国家重大现实问题，而重大现实问题背后，往往蕴藏着前沿的理论问

题。这使我在发展中心的政策和理论研究可以做到相互支持，而且受益于中心自由的研究氛围和启发性的工作环境。最后，我还要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同事们对出版此书的帮助。

此书出版之际，我将成书的背景简单梳理，以为序。

张永生，2020年5月25日，北京